

欧
洲
传
播
思
想
经
典
译
丛

普通媒介学教程

[法] 雷吉斯·德布雷 著 陈卫星 王杨 译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清华大学出版社

欧 洲 传 播 思 想 经 典 译 丛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普通媒介学教程

[法] 雷吉斯·德布雷 著 陈卫星 王杨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Editions Gallimard, 1991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2428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媒介学教程/(法)德布雷(Debray, R.)著;陈卫星,王杨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欧洲传播思想经典译丛)

ISBN 978-7-302-37278-3

I. ①普… II. ①德… ②陈… ③王… III. ①传播媒介—教材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9920 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封面设计: 傅瑞学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刘海龙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mm×230mm 印 张: 31.5 字 数: 38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600

定 价: 58.00 元

产品编号: 023542-01

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

——《普通媒介学教程》导读

陈卫星

一个孤独的思想幽灵在这本书的开端和结尾浮现，以卡尔·马克思为参照，社会学家孔德在 19 世纪社会学界更加边缘。这并不妨碍雷吉斯·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学教程》里反复提及他的名字，以及他的思想。在德布雷看来，尽管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没有获取现实的成功，尤其是创立人道宗教的流产，但却留下探索人类精神历程的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的三状态法则为媒介学提供一种思考的外在框架。

媒介学（Mediology）这个新名词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德布雷 1979 年的著作《法国的知识权力》里。按照作者后来的阐释，从学科意义来讲，媒介学不是媒介社会学，也不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路数也不同，因为它不聚焦孤立的个体，而是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论述范围或论据来源包括历史（技术史、书籍史、美学理论和历史）和信息传播理论。由于研究范围的跨度大，媒介学无法对媒介提供一个唯一性和排他性的概念

指称，反而不得不涉及相关学科分支的交叉，各种传递载体的特征，各类信使的角色，各个介质的功能，等等，比如说“书”是一种媒介，那么从媒介学的观点来看，就要同时包括文字、作者使用的语言、纸、编辑、印刷工艺和发行等，才能完整呈现“书”这种媒介。虽然作者也按照自己的非学科门类建制的概念标准界定讨论的边界，但也可以想象读者会同时面对困惑和诱惑。

媒介学的知识意图

媒介学作为专业学科有没有学术合法性？这是很多学者面对媒介学问世的一个疑惑。但是在具有强大人文学术传统的法国，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举例来说，早在1969年，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讨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科复合时就说过：“历史学家显然对于社会符号和象征，对于持久的基础社会功能注意得不够。”¹ 德布雷的看法是，和历史学相比，媒介学的第一个区别是研究历史转化而不是历史年表，第二个区别是研究生产集体心理的信息模具。媒介学更关注是什么抽象理念和技术手段的结合酝酿和组织了社会群体及其运动，研究历史过程的魅力或说服力是如何隐藏在地理场所、机构组织、物品流通和社会心态当中的，探析思想、思潮、运动背后的象征机制，从而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区分开来。

本书问世之时正是互联网席卷全球的前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越来越丰富多样，日新月异的信息手段和传播终端几乎是我们的生活甚至身体的一部分。传播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其重要性已众所周

1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城、周立红译，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知。但决心要往后看的媒介学的关键词是传递（*transmission*）而不是传播（*communication*），虽然两者有共同之处，都表示一种中介化行为和时空过程。按照作者的说法，“传播是一个长时段中的时刻和一个广大整体当中的碎片，习惯上我们把这个整体称之为传递。”¹换言之，传播是在一个空间中完成，是在同一个空间——时间——领域当中的信息运动，是一个长长过程中的节点；而传递强调时间的维度，意味着是在不同的空间——时间——领域当中的信息运动，是基于参与者的能动性和环境要素的结果。不能仅仅将 *transmission* 理解为一个被动的历史性过程，因为其中不仅包含基于技术平台的物质性流动过程，而且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Le médiologue rejette la hiérarchie sujet pensant, supérieur/objet matériel, trivial*）。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界面差异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信息再生产，比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所代表的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模式的差异在时间流程中的累积效果。

有别于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即时性效果研究的心理学特征，媒介学的研究突出人们在媒介使用过程中的潜移默化所带来的精神行为的影响，属于历史范畴。媒介学所展示的媒介功能是它的所有形式在一个长时间范围中的活动。以图书馆为例，人们可以阅读，同时也能够召集人来写作和进行传递活动。图书馆是个媒介，但力量来自围绕和参与的共同体，是前一代人对后一代人或当代人之间的文化传承和交流，包括知识和传统、热闹与冷僻、议题和争辩等，虽然当下的图书馆的人群聚合效应正在向互联网转移或被互联网稀释。那么是否可以说媒介学的研究不满足于见人不见物的单元路径，刻意把握传递手段具有的双重性：一

1 Régis Debray, 2000, *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PUF, p.3.

方面是技术配置（记录符号的表面如文字或视听符号的呈现方式，解码程序的各种接受方式，扩散手段的基础设施和实物）的发明和运用；另一方面又是有机配置（制度、语言、仪式）的创建和普及？理论文本的实践路径其实就是一个实体化过程，而这个过程亦是一个知识化、工具化和媒介化的过程。

这种研究取向的确来源于作者自己提出的一种历史观：“在《政治理性批判》一书中，我曾经试图说明人类历史是合二为一的两个历史。事实上是两个相互交叉的记载，但是要合理地加以区分（如果混淆就会产生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在知识上和治安上都是如此）。有人与人的关系史，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史。前者是一种可逆反的强度，一种不分前后的重复空间；后者是一种积累性的延伸，一种发明与发现的开放空间。艺术、宗教、神话、政治属于第一个领域；科学和技术属于第二个。”¹ 主体与主体的历史构成文化史，主体与客体的历史构成技术史，而通过媒介学，发现两者可以交叉，既是工具性关系也是文化关系。这样，作者就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蜚声国际史学界的第三代“新史学”之外，另辟蹊径地找到一个研究方向，即把人类文明史上与信息移动相关的物质变量统合起来，借助技术性、物质性、微观性的研究为历史提供另外一个多元、偶然的开放视角。

媒介学的目的是考察信息传递中高社会功能（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态度）和技术结构的关系，思考媒介如何运载信息。这差不多要回溯到文字的诞生。字母文字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前提，如果没有“字母”，人就不能成为“字父”，就不能成为语言含义的创造者，也就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并衍生出作用他人和外界的权力，从而引申出象

1 Régis Debray, 1991,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éditions Gallimand, p.39.（以下的引用简称原著并注明页码）

征效力：符号－词语、写作和形象如何产生特殊效果并在给定的社会成为物质性力量。

媒介学的中心是发现技术和文化的互动结构，考察一个社会结构和（跨社会的）社会关系如何在一般意义上和影响传递的技术结构进行互动。比如一个词语化为行动，一个观念成为集体力量，一个信息影响了世界观，这经常是在一个可以测量的时段，如一个月、十年或者千年当中产生和延续，在今天可能是以碎片流的方式闪现。当下的人们往往被迫去追逐即时性的流动信息，但人类社会总还是有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和无意识需要去重新探究，比如基督教如何在一个时间范围中通过经典文献的生产和阐释逐渐形成神圣性，《圣经》何以被转化成为一种制度进入物质化的组织，拉丁文版的《圣经》何以随着印刷术、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结合被转换为其他不同文字的版本。借助媒介、技术工具对事和人的相互影响的记录载体逐渐扮演集体记忆和社会档案的重要角色，整体意义上的物质性载体和符号手段担保每个时代的社会存在。

因此，媒介学意味着以一个更为宽泛的方式来分析一个社会和超社会的文化传递，尤其强调人的组织和技术创新为保证文化传递能力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对媒介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效果进行阐释和说明。以媒介学这个术语来说，**Logy** 表达科学的特点，而 **Medio** 是中介背景，其中传递是一个技术、社会和文化性质的复杂的、多重的网络。这涉及三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不同外观符号所构成的象征形式，不同地域、民族、性别、阶级的人群的集体组织，以技术制式作为区分的各种传播技术系统。这种跨学科跨社会的穿越历史式的研究思路，所产生的知识功能是通过技术和文化的界面关系的历史路径来考察观念的生态环境和思想的物理性能的，研究广义上的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共生关系，即我们知道或应用的关于记忆、传递和位置移动的技术，如何修改和调节

我们的思维观念、信仰模式和知识类型，为思想史的分期提供另外一种参照。

从这个角度出发，《普通媒介学教程》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验证，其主要内容呈现出一种历史学的结构，从公元前后的基督教的起源到 19 至 20 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间穿插印刷革命的铺垫，正是书籍和知识的扩散推动了宗教革命，启蒙运动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建立共和制和创办公共教育，在 20 世纪初期实行政教分离并颁布社团法。

西方文明史上承前启后的宗教改革是本书的一个讨论重点，作者甚至直接把 16 世纪的文本反叛和 20 世纪的电子革命并列为文明史的大回旋。结合文化史、印刷史和阅读史所提供的实证研究，试图让一种被媒介化的社会文本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和阐释机制。作者的理论发现就在于看到一种物理状态如何产生非物理的效果，或者反过来说人们在一种观念的引导下所产生的社会实践的创新。

举例来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就技术的社会挪用来讨论技术应用的社会性质，本书对印刷史的研究证明，印刷工艺流程的质检技术规范使得信息内容的核对成为现代工商职业伦理的一个起源。正是排版要求字词校对的一丝不苟，正是各种旨在修改、篡改和阐释的泛文本的参与逐步扩大人们的认知视野。从此以后，理性主义从职业态度上升为一种抽象观念，要求权威必须有原则，任何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都开始不得不得受理性的挑战，并在这种挑战中让媒体技术扮演历史的接力棒：“文字最初是教士的特权，可它后来也成了政教分离的承载者，支配的工具，革命的介质。”¹

当技术规范转化为职业伦理之后，就逐渐成为社会伦理的一个组成

1 原著，208 页。

部分。如是说来，源于技术规范的职业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技术创新所代表的新生产力打破二元论的画地为牢，因为技术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生态，今天谁还能把互联网单纯归类为经济基础或是上层建筑？技术的历史始终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在一起。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性能所提供的人性的表达能力和表现范围，历史的时间向度才具有意义。这就产生了两个人类学的假设，一个是人性是否最后跟随技术对人的解放所提供的可能性？另一个是人们对时间的选择究竟是地方的时间还是非地方的时间？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三部曲当中所提示的这一思想显然为媒介学的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¹而这一切，始于神的故事如何转换为人的故事。

从宗教起源到人的组织

1991年问世的这本书的意图，归根到底是要从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路从宗教人类学开始：“让我来提醒你们媒介学想要研究的问题：一个观念通过哪些媒介化成为一种力量？一个话语如何能造成事件？一个精神如何能获得实体？”²就考察媒介与宗教的关系而言，作者显然比同时具有技术现实主义和政治天使主义特征的麦克卢汉走得更远，回到西方古典经学的源头，直接把信息（《圣经》）、弥赛亚（基督）和中间人（传教士）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最原始的媒介学结构，即如何为一种信息找到通过载体使其社会化的组织形式。

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媒介化的研究样本或标本，是因为教会的历史是

1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三卷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012。

2 原著，92页。

人类社会历史的一条精神导线。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曾指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¹无论是从话语体系来说，还是就组织力量而言，19世纪的马克思已经看到基督教的惊人传播能力以“启示”的方式所显现出来的强大意识形态功效，从而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坚决提出：“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难以预见的是，这种批判不仅没有根绝各种后来出现的短暂的世俗宗教，同时还是今天继续争论的“文明的冲突”的诱因。

作者通过对“三位一体”这个基督教概念谜团的分析表明，围绕着一个被作者称为化身的对象，人们开始博弈这种那种的说法和观点。人们如何认识上帝？“如果他是人，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上帝，而如果他是上帝，他就不是真正的人。或者：如果基督有两种本质，那就是说他是两个人，那么两个人又如何能成为一个？”²经过无数次的争辩和斗争，基督教最终达成“位格合一”的共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并就此演绎出一种组织人与人的权力关系，以及维持和延续某种制度的神话结构，“胜利的教会终究让不可知的事物承担其头衔以便被认可为上帝话语的拥有者，并从中获得它为整个地球制定规则的权力，即为世界掌舵。”³这里潜藏着一个宗教人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奇妙链接，难怪作者始终在书中为“政治学”加上引号，因为政治首先不一定是可以从物理上把握的对象，而是一种可以制造、酝酿和感染的心理。

为什么媒介学的研究要从对基督教的研究开始？作者的问题设置是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原著，96页。

3 原著，97页。

思考一种抽象思想如何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什么是思想的力量？一个关于唯一的、总体的、普遍的上帝如何取得如此强大的力量并通过仪式予以呈现？被化身到人身上的一个完全抽象的关于上帝的力量如何导致古罗马帝国的社会心理的起伏并在后来成为与世俗权威并列的精神权威？人们是如何逐步地皈依这种看来并不体面的信仰？所有这些问题聚焦在对传递手段的研究。如果说媒介的作用在于产生一种精神作用的传递，“‘精神’以什么条件起作用？条件就是为精神配备一个传递装置。”¹ 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显然在哲学上没有意义，因为媒介总是要和一个载体在一起才能存在，才能有效，才能发挥作用。作者的结论是信使决定信息（le messager conditionne le message）。比如说字母文字的发明和手抄本这种新技术提供的分享逐渐被固定下来，是普遍意义上的上帝起源的一个条件。

从宗教的媒介化传播的历史经验来看，任何思想内容的传播效率往往不是来自思想的成就，而是简单的形式：“基督教在古代世界的宣传事实上确认了情感对于理智的胜利、直觉的诱惑对推论的确信的胜利、主观对客观的胜利。也是实践的利益对理论的无私的胜利。”² 那么，如何达到这种效果？作者是这样描述的：“一般来讲，从低处可以传播得更好。解码成本低，听众却更广。通过低处进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获取的优势或者我们说是它的成就。地理上通过周边，如同一个移民者和迁徙者的宗教。社会上通过底层贫民、手工业者、女性、移民——总之是最没有文化的阶层。文学上通过最不庄重的形式，传记而不是形而上学、书信而不是论文、布道而不是课程。这使得听众最大化。如果不是在公元 2 世纪和 3 世纪获得的广大受众，基督教就可能无法在公元 4

1 原著，126 页。

2 原著，128 页。

世纪有更高的突破和更远的传送。太早被理论化，它就可能会消逝在路上。”¹最易于传播的信息是无法得到验证的信息，最容易让受众参与的信息是给受众提供想象空间的信息，也可以说是更加本土化而不是理论化的信息。这里似乎呈现出传播制胜的两个特征：第一，如果说传播是旨在追求受众效果，那么首先就要对受众不加区分，从而产生极大化的受众指数。第二，传播的内容能够从信息供需的个性化角度产生呼应，私有化成了信息接入的最佳通道。后面一条差不多成为今天娱乐传播的大众化明星制的来源：粉丝更容易为崇拜一个个体而进入一种狂热状态。

那么基督教是不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泛组织社会学？作者的推论是：“人类伟大的信仰产品都是**集体组织的手段和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总是身体启发精神，而不是相反。”²从表面上来理解，似乎是在说人对信息的接受要基于一种感性的选择，由感性行为滋生出一种动态逻辑，这种动态逻辑就是权力的运用及其扩张：“基督教启示录的‘令人赞叹的宣传’令人赞叹地阐释了这个假设：思考，就是组织。组织，就是等级化。信息扩散活动的双重性是，一方面建立一个重新扩散者的团体；同时在团体中建立权力关系和差距关系（*upakouein*，希腊语中的服从，指的是从下向上听）。这种关系使得短暂的传播通向长久的制度。”³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提出的“舆论领袖”概念是按照信息旅途的先后排列出受众序列，这在基督教中是不言自明的。

基督教的奥秘是化身逻辑在人的世界中通过教会的组织结构、仪式和教规形成一套有效的中介链条。“天主教的圣徒并不是神，而是圣灵的一个典型的小媒介，一个新的说情者和一个接触点。上帝需要人，而

1 原著，129页。

2 原著，142页。

3 原著，142页。

人需要圣徒去接近上帝，教会就是用来满足大众需要的。”¹ 一方面是信仰系统在传递中获得化身，另一方面是信仰本身成为被赋予信任的载体。化身才能是基督教的力量所在，而这是通过一套组织化的结构和打造得以形成，宗教的权力转身为权力的宗教，由此开启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历史。沿着这条轨迹，宗教把人类学能量转移到经济学的功利和政治学的决断：“对于人对人的权力关系感兴趣者，将会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混合物，即一种现实秩序在另一种现实秩序中的移动和变化规则。如从说到做。”² 这里隐藏着传递的非线性机制所内含的风险，因为一个话语和一种理论在一种新的语境中被挪用或被解读，始终是一种转化过程，不排除被翻转的可能。正如作者在《传递的赌注和手段》一书当中的疑惑或感叹：“究竟是什么使得对爱的福音成为宗教裁判所？然而这的确是在传递。一个传递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快乐传递，经常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个信息的翻转。”³ 的确，从历史语义学的观点来考察人们的观念史，总会发现观念本身是个历史时空的变量，从空间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意义结构、一种语义场、一个概念网络中的组成部分；而从时间向度来考察，可能就仅仅是一种话语策略，一种情境的需求，一种场合的应和，一种身份的扩张，甚至一种利益的绑架，等等。信息与信息的载体不一致无疑是媒介学的一种发现式的举证。

从早期基督教集体诵经的交融过程开始，通过载体（比如口语表达）的传播创造出一种集体身份的来源，以救赎为宗旨的神学建构转化为一种制度性质的政治建构，宗教社会学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的前身。如果说“教会先于奠定教会的经典。不只是教义具有集中效应，而是任何集

1 原著，110页。

2 原著，112页。

3 Régis Debray, 1998, *Les enjeux et les moyens de la transmission*, Editions Pleins Feux, p.41.

中都有教义效应。”¹之所以说教会的存在先于经典的颁布，是因为任何教义的发布都要经过教会组织的过滤和筛选。在西方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宗教史上，往往会看到没有组织力量的新闻释最后沦为异端，直到宗教改革运动成为人类自我解放的新社会运动。

从使徒的个人热情和牺牲精神，到教会的组织过程和教义表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象征化组织是这个关系的核心，这不仅是神话的来源，更是人们在自身的历史环境中确定自己的存在意志的精神动力。“人们信仰因为人们分享，人们信仰分享并同时信仰人们分享的东西。再聚集是信仰的要素构成。这就是说：没有横向的组织就没有垂直的教派。”²由此产生传播制造权力的三个界面：第一个是组织能力，第二个是信息内容，第三个是分享机制。分享是信息传播得以形成的人类学来源，应该说是横向的，而对这个分享的组织过程是一个同时包含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基因，又形成纵向序列。如果说宗教的历史启发了世俗社会对宗教规则的模仿，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世俗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思潮，一旦被制度化之后，就有可能演化成为一种世俗的教权主义？

人类社会对权力的认知和追逐首先从对信息（内容指称）传播（集体组织）的重组开始，开创各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要进行传播就需要有组织，有组织就意味着有意识形态及其代言人。人们习惯于认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是指一套教义或学说，其实它更多地是一种组织功能：“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存在于这个意识形态能够带来的一致和归属原则里，在它统一和整合的功能中。价值的重要性没有价值共享的重要性高。通过将学说作为一个简单的相互确认的规则来处理，即一个旨在统一精神和意志的信号集合，学说进入约定的意识形态跑道，好比组织

1 原著，155页。

2 原著，144页。

手段和聚合技术。‘简化的’思想不见得缺少指导性。”拉斯韦尔的五个W恰恰就是从谁有权力向谁传递什么信息开始的，信息组织的过程，就是一个对象性质的关系建构过程，人的组织过程与信息的传播过程同步。

媒介生态学的历史辩证法

另一位多次出现在书中的学者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安德列·勒鲁瓦·古兰。作为技术人类学家，他能够把技术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古兰的思想试图阐明人类文明的技术进阶问题，如果技术演变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存在强烈的相关性，是否存在一种“技术生物学”？这似乎是媒介学原理的一个基石。这里不是要主张技术决定论，而是着眼于一种人类学意义的考察。“早在麦克卢汉之前，文字历史就曾经把媒介即信息予以物质化，表明物质如何影响记录工具，而这个记录工具又支配书写形式。媒介学将这个运动扩大，将文字领域中的物质操控延伸到精神和象征世界。记录工具改变记录内容的精神，也改变一个时期的精神特征，一种时代精神的风格。几千年的价值和要素阶梯将内在性、精神、意识置于高处，以恩赐的方式将物质标记置于低处。”¹人文主义的优越姿态无法替代物质手段的必需性。

作者的阐释说明，人类在精神层面的再现始终是和物质载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分不开的。换言之，物质文化的技术性能是物质文明的一个刻度，物质的技术便利是社会的流动性的新指标，亦是新的诗学想象的来源。人们习惯于站在已有媒体的实践平台上对新媒体的各类风险提出各种预警和各种限制，最终还是让位于人们对新媒体的自由开发和应用。

1 原著，196页。

恰恰是媒体这个栅栏本身在媒体自身演变的逻辑中打开走向未来的通道，席卷所有的质疑、警惕、不安和怨恨。技术革命被纳入资本的逻辑或遭遇政治的压迫，激起审美的反叛和伦理的革命，最终胜出的是越来越快、越来越碎、越来越自我的时间美学。当一切事物都变成暂时性的时间流程其中的一个节点时，价值不再确定，价值只能逐渐褪色。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往往是资本的效益逻辑高于权力的地缘逻辑。

与传播学界的工具主义的概念划分不同，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最新颖而富有想象力的核心概念是媒介域（*médiasphères*），就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游戏规制等）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按照媒介学的史学观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的界定，人类文明史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这三个媒介域的详细分类被列表在书的最后。

作为媒介域概念的内核，作者有几条纲领性的观点，简述如下：

- 人类的思想活动不能脱离当时的媒介技术的记录、传递和储存；
- 维持记忆的技术手段是第一位的；
- 占统治地位的传媒系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组织的核心；
- 每个时代的媒介域都可能混杂着不同的技术载体；
- 每个时代的传媒方式的主旨就是对其时代进行定义或制造信任；
- 传媒系统的技术特征是理解每个时代的象征系统的主要线索。¹

媒介域的概念旨在说明传递技术及其制度配置被牵连进信仰的改变，也就是社会秩序的确立和改变。“归根结底，媒介学贴近历史的研究角度同时使思想的具体媒介化重新获得其内在联系，使媒介功能重新

1 原著，229-230页。